

Ming China and Vietnam: Negotiating Borders in Early Modern Asia.
By Kathlene BALDANZ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xi, 235pp.

在中越關係史的研究中，明代是研究者關注較多的時段，一方面由於明代恰逢全球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明朝與周邊各政權的關係呈現出新的發展局面；另一方面，隨著當時越南內部黎朝與莫朝之間的政權爭奪，明朝與黎、莫雙方的關係也經歷了諸多變化和調整，研究者對明代中越關係進行過各方面的研究，而本書正是一部探討明朝與越南關係的新著。該書作者 Kathlene Baldanza，目前任職於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中國明清史和東南亞（尤其是越南歷史）。作者以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時期的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於2016年修訂、補充出版該書。全書在結構上由導言、七章正文內容以及結論三部份組成。作者以不同時期的歷史人物為主要線索，以相關歷史文獻分析為依託，對明代中越關係，尤其是邊境管理等問題作出了具體的分析和討論。就內容而言，作者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在導言中，作者以「越南」名稱的來源及使用的歷史故事作為開端，引出研究主旨。阮朝建立之初，阮福映派遣鄭懷德、黎光定出使清朝請封，請求清朝賜國號「南越」。但嘉慶帝未予認可，而將「南越」二字顛倒順序，稱為「越南」。以往的中越關係研究已經認識到中國對越南文化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影響，但是很少有人考察這種影響的產生機理和運行模式。一般而言，學術界對中越關係的歷史考察，多聚焦在中國的入侵和越南的反抗，鮮有注意各自內部的爭論和分歧，正如作者指出的，這些內部的爭論和分歧，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中越雙方關係的發展。

第一章簡要地回顧了明朝之前中越關係的發展歷程。作者以北附元朝的黎崱及其《安南志略》一書為切入點展開討論。1285年元朝入侵陳朝之時，作為幕僚，黎崱隨同陳朝皇族成員陳鍵投降元朝，寄居湖北漢陽，並在晚年著成《安南志略》一書。作者認為，通過對黎崱本人生平及其《安南志略》內容的分析，尤其對於其詩歌寫作的剖析，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明代中越之間模糊和重迭的政治及文化邊界。

第二章重點分析另一位北附明朝的越南人胡元澄（即黎季犛之子黎澄），胡元澄本是越南胡朝創立者胡季犛（本名黎季犛，後改名胡季犛）之

子。永樂年間，明軍征伐胡朝，將越南重新納入中原王朝版圖，胡氏子孫成為俘虜被押送至北京，胡元澄因為擅長兵器，遂任職於工部，成為明朝的臣屬。作者以學術界較少關注的黎澄為主要線索人物，通過分析黎澄的生平經歷及其《南翁夢錄》一書，指出明朝對越政策從朱元璋到朱棣，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胡元澄的人生軌跡亦受到中國對越政策的深刻影響。而正是由於明朝對越南從佔領到棄守這樣一個過程，越南的地位和歸屬問題，成為明朝內部爭論的焦點。同時，明朝在越南的勝利與失敗經歷，為此後明朝考量對於越南內部事務介入與否提供了歷史經驗和爭論方向。

第三章作者題名「北帝與南帝」，這一章主要線索人物為明朝的嘉靖皇帝和越南莫朝的莫登庸。1527年，莫登庸篡黎，建立莫朝。越南的內亂引發明廷對是否出兵干涉的激烈爭論。隨着明朝對莫登庸及其建立的政權的逐步了解，愈發對其「帝王言辭」深感憂慮，因為越南莫氏的行為，嚴重挑戰了明朝宗主國的地位和權威，並危及邊境安全。作者以此為主線索，探討雙方統治者和官員對於邊境危機的處理。作者進一步分析認為，明朝官方在應對邊界問題時，通過勾畫出清晰的文化和政治邊界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

第四章以明朝欽州官員林希元為人物線索，分析了明朝與越南在欽州問題上的較量，探討了明朝與越南的邊境糾紛問題。作者通過對林希元的分析，揭示明朝在南部邊疆地區的統治，充其量只是名義上的。面對越南莫氏的離心以及對邊境地區的不斷侵擾，林希元為代表的主戰派，上疏力主征伐。作者認為，雖然林希元最後被罷官免職，但是在明朝解決邊疆危機、加強邊境地區統治的過程中，林希元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五章進一步分析了明朝與越南莫朝的關係。莫登庸向明朝投降的事件，歷來被史學家認為是一種屈辱性的失敗，不過對於莫氏來說，可能又是另一種情況。作者以明朝邊境地區的官員江一桂這個人物角色為視角，通過對比分析莫朝以及中越各種史料，揭示了彼此雙方在這樣一個邊境危機事件中，如何利用種種手段增強各自的政治資本。

第六章重點論述了貫穿於整個16世紀後半期的地區衝突，儘管越南黎朝與莫朝之間的戰爭造成大量村莊被毀，數以千計的民眾失去生命，但是這些歷史情況卻很少被關注。1592年，莫朝被中興黎朝打敗，黎朝再次統治越南北部地方，莫氏的殘餘力量逃到中越邊境一帶，以高平為據點自保，直到清朝初年，方被黎朝剿滅。作者認為，以上各種事件應當成為理解莫朝滅亡以及此後中越關係走向的基本要素。

在最後的第七章中，作者描寫中興黎朝大臣馮克寬的事蹟。1597年，馮

克寬以正使身份出使明朝，希望恢復與明朝的關係。正如此後阮朝的建立者阮福映一樣，中興黎朝政權渴望其正統身份得到明朝的承認和接納。作者分析馮克寬的詩歌及其與朝鮮使臣之間的交往，認為越南中興黎朝呈現出更加自信的国家意識。

全書以人物為主要線索，對各時期的中越關係進行詳細的分析。在以往的中越關係史研究中，多數學者或將焦點集中在中國歷朝對越南的入侵和越南的反抗上，或局限於朝貢體系的窠臼中，往往都將目光局限在國家的歷史傳統上進行表述和分析，很少跨越邊界去看待問題。縱觀本書，作者試圖擺脫舊有框架的束縛，利用中越雙方的史料和視角，完成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跨越國界的中越關係史研究。概括而言，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作者不再局限於對這一時期中越關係進行敘述性的概括，而是通過對文人、官員以及統治者生平、書信以及詩歌的分析，全方位的探討中越之間在文化、歷史和政治邊界上的交往。作者在書中以中國與越南莫朝的關係作為審視中國的邊疆管理及運作狀態的視窗，在16世紀，越南政權和社會的巨大變化和隨之而來的動盪，迫使明朝重新評估和考量與南部鄰國的關係。在借鑒歷史的先例和地方志中對國家認同描寫的同時，明朝官員就越南是否在中國統轄範圍內，或是以另外一個國家的身份進行交往進行辯論。本書的一個寫作特點是以歷史人物為主體線索，進而展開相關歷史事件和背景分析。用當事人文字記錄來窺探當事人的思想和主觀意願表達，更加貼近歷史的真相和歷史事件的複雜背景。

其次，運用中越雙方的相關史料，以第三者視角看待歷史上中越之間的交往和衝突。擺脫了主觀上的國家視角，更加全面地審視明朝與越南黎朝、莫朝之間的利益與衝突。作者強調這一時期明朝和越南之間的軍事和外交上的關係總體上呈現內部分歧和外部結盟的特點，尤其顯示越南對於東亞的經典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進而產生的國家意識對中國明朝造成思想上的威脅。

最後，「從周邊看中國」的學術理念提醒研究者從不同視角來審視歷史上中國與周邊政權的關係，反過來，也從周邊視角出發，重新認識歷史上的中國。可以說本書是基於這樣一種學術視角，來看待明朝與越南的交往與發展，分析明朝與越南的政治、文化等關係。正如作者所言，其研究目的不在於用中國的史料去撰寫一部越南歷史，或者用越南的視角去單純看中國歷史，作者希望綜合各方資料、視角以及中越雙方文人、官員共同的關注點，來寫一部全面的中越關係史。

總體而言，作為最新的中越關係史研究成果，本書會給讀者帶來啟發和思考。

魏超

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By Yee Tuan WONG. Singapore: ISEAS, 2015. xxi, 228pp.**

這本書以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檳城五大家族——邱、謝、楊、陳、林——在商業上的發展與沒落為個案，指出這段時期檳城的經濟發展之餘，也指出東南亞在所謂的「華人世紀」的19世紀的經濟發展。與過去強調從上而下與從西方人視角看待檳城的角度不同，本書以檳城五大家族為代表，採取從下而上的角度來解讀檳城的發展。本書作者仔細梳理了大量的政府檔案、當時所遺留下的商業指南以及大量的舊報紙與其他文獻，明確指出五大家族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運作，從中下層角度來檢視19世紀的東南亞經濟史。同時，本書不同於以往強調華人商業網絡的重要性，以及從概念出發來檢視華人商業網絡的方法，而是從五大家族的網絡這一個案出發，揭示出一個橫跨區域、種族、方言群與階級的商業網絡，以修訂以往對於華人商業網絡的刻板印象。

本書一共八章，其中第一與第八章分別是序言與結論。第二章先講述19世紀檳城的商業地位，以及五大家族所涉及的事業。檳城在1786年開港，並且成為英國人的貿易地點之一。但是作者認為檳城並非如一般所想像般是由英國人完全控制與主導。相反，檳城的建立象徵着英國人進入「華人世紀」下的東南亞華人商業網絡，因此檳城反而是由本土華人商業家族（其中就包括了五大家族）所控制的商業中心。此外，檳城並非自新加坡開港之後就淪為區域港口，相反的，檳城在當時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港口，不但直接輸入或輸出各種商品，並且主導了從印度東岸到馬六甲海峽北端的貿易，是這一片海域的貿易中心。

五大家族來自福建，但是他們所涉及的事業不限於當時福建人所擅長的航運業，他們跨足人口買賣（豬仔與苦力）、種植業（從最早的荳蔻、椰子